

# 雷海宗批判

孫定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9238  
1238

# 雷海宗批判

孫定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雷海宗批判**

孫定國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32公厘 1/32 印張1 7/16 字數27,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3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數3,001—4,000

統一書號：2074·91

定 價：(7) 0.14元

封面設計：任 意

## 前 言

从历史上看来，雷海宗从来就是一个极端反动的人。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疯狂地向党和国家进攻的时候，雷海宗所扮演的脚色，尤其是十分丑恶的。

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了雷海宗以重要的工作职位，希望他痛改前非，走上新生的道路。可是他却背恩负义，仍然走着邪恶的道路。当钱伟长、费孝通等右派分子在北京叫嚣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在天津也叫嚣得最厉害。他披着历史学家的外衣，疯狂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方面成为历史学界的急先锋。事实证明，雷海宗正如费孝通、吴景超等右派分子一样，是借学术论争之名实行政治斗争之实。他歪曲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实行着为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

在对雷海宗的批判中，已经有人写了不少的好文章，雷海宗的这种阴谋已经被揭露无遗。作者的这两篇小文，前一篇是理论上的批判，后一篇是政治上的批判，都是在紧急的战斗情况下写成的，还不能算作对雷海宗的系统批判。

记得在1954—1955年，全国思想界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展开批判的时候，雷海宗曾经大发谬论：胡适是

近世紀來中國的一個怪傑，誰能批判得了他？等着階級消滅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再給胡適作結論吧！（大意如此）事實上中國人民已經給胡適作了結論，同時也證明揭露胡適在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反動實質，也並不是那樣困難的。不知道在今天批判雷海宗的時候，他是否也如此地不服氣，是否也作如是想法？中國人民給雷海宗所定下的結論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學者，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歷史學家。

聽說雷海宗已經作了初步檢討，我們希望他真正作到言行一致，重新作人，以求得人民對他的寬恕。因為雷海宗畢竟還是生活在祖國的大地上，他比起寄居在美國過着搖尾乞憐生活的胡適“博士”來，在客觀上存在着根本不能比擬的優越條件。

作者

1958年2月14日

## 目 录

前 言.....	1
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	1
雷海宗的毒箭.....	18

## 揭穿雷海宗反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共产党的领导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走另一条道路，要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从各方面来反对共产党，反对党的指导思想馬克思主义。費孝通、陈振汉是如此，向达、雷海宗等人也是如此。

雷海宗在历史界的进攻是有綱領的。他在人民日报編輯部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談会上和在天津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发言、在天津日报笔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栏中所发表的“只有相見以誠，才能談到互相监督”，以及他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的講話就是。必須指出，雷海宗的这些綱領性的意見，正是那个为章、罗联盟服务的曾昭掄、費孝通等人所拟訂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費孝通、吳景超等在北京叫囂得最厉害的时候，雷海宗在天津响应得也最快，叫囂得也最凶。雷海宗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既有言論又有行动的。因此中国史学界和雷海宗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不同学术見解上的斗争。必須指明，雷海宗算不得什么历史学家、什么科学研究工作者。他是如同人們所說的“披着羊皮的豺狼”。他极度仇視共产党，

仇視馬克思主義，仇視人民民主專政。他披着學者的外衣惡毒地向社會主義、向全國人民進攻。我們必須徹底粉碎這個進攻。天津史學界首先舉起戰鬥的旗幟，是做得完全正確的。全國的科學工作者，應該有力地支援這個鬥爭。堅決地打垮雷海宗的進攻，這不只是史學界的任務，而且也是整個科學界的任務。他進攻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同時也就是進攻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雷海宗的反動理論是不值一駁的。我們不要認為雷海宗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學者，他只不過是一個裝着大象的螞蟻，靠着空架子吓人！）

我在這篇短文中只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首先是關於雷海宗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不管他說馬克思主義是在什麼時候停滯的，1895年也好，1872年也好，這都沒有多大關係。問題是在於雷海宗是否僅僅只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停滯了的問題。因為說是停滯了，那還是認為在這個世界上還曾經有過這個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不是這樣的。雷海宗並不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停滯了，而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根本就不存在。分析一下下邊的情況，就可以看得很明白。雷海宗在他的講演里公然說：馬克思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中提出古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在這個問題上，他認為恩格斯、列寧以及斯大林都和馬克思不一樣，也就是說這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和馬克思有矛盾，因為他們忽視了或者不能了解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重要的發現。至於以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那就更不用說了。（關於亞細亞



生产方式問題，我在这里不准备去多講它，苏联科学家討論过，我国历史学家也曾經討論过，大家都知道，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超出五种生产方式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它實質上是指的带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馬克思在这两本書中以及在“資本論”中所分析的历史发展阶段問題，基本上是一致的，並沒有什么矛盾。)在这里雷海宗向我們提出了推崇馬克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按照雷海宗的邏輯，推崇馬克思的不是馬克思的忠实战友和学生，不是恩格斯，不是列宁，不是斯大林，也就是說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相反，推崇馬克思的，倒是馬克思主义的敌人反馬克思主义的雷海宗。这真是不知人間有羞耻事！雷海宗的作战手法，太幼稚也太恶毒了。他首先是伪装着“推崇”馬克思，以馬克思来打倒恩格斯，打倒列宁，打倒斯大林，把馬克思完全孤立起来了，而最后又反轉过来把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也就是由“推崇”馬克思的雷海宗来打倒馬克思，推翻馬克思。正如他自己所說“馬克思在哲学上没有什么”，而他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的講話中，又归根結底只是为了証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反科学的，是根本錯誤了的。試問，这样，那里还有什么馬克思主义呢？既然沒有馬克思主义，那里还有什么停滯与不停滯的問題呢？必須尖銳地指出，在雷海宗的眼目中，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存在，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这才是雷海宗的真实思想。至于說什么“停滯論”、“过时論”等等那只不过是一个花招。我深深感到和雷海宗去辯論什么馬克思主义是否停滯了，或者和他去爭論馬克思主义並沒有在某年某月停滯下来，而相反地是大大发展了等等，尽管是我們必須进行的工

作,但对于雷海宗來說,多少是有些“对牛彈琴”的味道。

当然,在这里,我們也还不能不指出雷海宗之所以要几費躊躇,而最后地說馬克思主义停滞于1895年,也就是停滞于恩格斯逝世的那一年,是显然含有着更大的毒刺的!把这个毒刺化驗一番,就可以看出雷海宗之所以最后地选择1895年作为馬克思主义“寿終正寢”之日,乃是雷海宗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本能的最露骨的表现。

誰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綱領批判”以及“爱尔福特綱領批判”这些巨著中所表达的天才的預測和远大的理想,只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期,才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这两位无产阶级大师所亲眼看到的,只不过是刚刚保持它的生存权利72天的由法国工人阶级用血肉换来的巴黎公社。在人类历史上,或者说在我們这个地球上出现了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偉大的列宁时代开始的。列宁繼巴黎公社之后創立了永立于不败之地的苏維埃政权,首先在两万万人口的苏联取得光輝的胜利。这个胜利标帜着无阶级的凱旋,共产主义的凱旋,同时也就是标帜着资产阶级的必然死亡,資本主义的必然死亡。这个胜利开始于1917年,而在1967年的今天,不过短短的40年時間,就发展成为将近10亿人口的国际性的胜利。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就是这个事实本身,已經足够說明馬克思主义在1895年以后的巨大发展,沒有这个发展,就很难說明在将近10亿人口中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力量是什么。誰都看得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論”,

对于在俄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指导作用；誰都看得見，毛澤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对于我們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指导作用。只要举出这两个显著例子就足以充分說明問題，更用不着去分析在这40年間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面貌了。即使是瞎子，也不能够抹煞自十月革命以来的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四个偉大时代，偉大的列宁还有斯大林以及毛澤东同志和他同时代的一些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于发展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重大的貢獻。可是恰恰在这一方面，是雷海宗以及一切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所最不甘心而且也是最为痛恨的。因为他們如果是承認了这一点，就違背了他們的階級本性，而承認了資本主义制度的死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为此，雷海宗才不能不詛咒馬克思主义，不能不誹謗馬克思主义，以至于干脆地說：馬克思主义停滯于1895年。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們才能够了解雷海宗放出这个毒刺的目的何在。显然，否認馬克思主义的列宁时代，这就是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梦寐以求之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階級专政由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无产階級专政的威力对于資产階級右派分子說来是个最无情的东西。对于在历史上就曾經是美帝国主义的追隨者、蔣介石的策士、朱家驊的走卒雷海宗說来，是一种“太山压頂”的力量。否認这个时代，否認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偉大发展的时代，对于雷海宗显然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无可奈何的办法。

其次是关于雷海宗不承認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奴隶社会阶段和反对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論的問題。

雷海宗根本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在他的否定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論这个問題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把历史叫做是生产工具发展史，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銅器时代，鉄器时代，机器时代，而在銅器、鉄器时代，只有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由此得出結論，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这完全是胡說。可是这个胡說却暴露了雷海宗的历史观的彻底反动性质。

很清楚，雷海宗的这种历史分期法，是美帝国主义御用哲学——語义学在历史領域中的具体运用。他企图用他所捏造出来的“部民社会”四个字来挖掉历史上的奴隶社会阶段，正象卡尔納普的信徒們企图用“人民資本主义”的字样来改变美国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一样，这显然是徒劳的。

可是，我們还必须明确指出雷海宗在这里所用的作战手法，同样是卑鄙的，恶毒的。

雷海宗清楚地知道，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著作之一。恩格斯利用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材料，并依据馬克思对摩尔根的著作所作的筆記，經過独立的研究所写成的这本书，完全科学地解决了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問題，例如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等等。这本著作的理論威力，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資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坚持的阶级社会的存在是从古已然的反动理論，而且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必然产生和阶级的必然消灭的客观物质基础。对原始公社來說，由于生产的发展（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說），阶级的产生是必然的，而对于資本主义社会来

說,由于生产的更高度的发展(当然也是相对的),階級的消灭也是必然的。在这里,恩格斯对于階級社会的产生和消灭的客观規律的分析,是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揭示了随着階級的产生,国家也就必然产生,而随着階級的消灭,国家也就必然随之而逐渐消亡下去的原理。在解决这个問題的时候,恩格斯使用了他和馬克思所一貫使用的研究古典形式的方法,把雅典国家的产生,当作一个古典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全面地考察了雅典国家产生的历史,向人們提供了考察羅馬、日耳曼以及其它国家产生和发展的鑰匙。国家的产生問題的科学解决,不仅对于肯定奴隶制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有階級的奴隶制是从无階級的原始公社发展而来的理論,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对于粉碎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关于階級社会的永恒性、国家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反动理論,都是无比犀利的武器。而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們的恩格斯得罪了“历史学家”雷海宗。他恶毒地把恩格斯的这部大著当作攻击对象。他唯一进攻的武器,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雅典宪法”。他認为“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如果看到,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中在有些問題的提法上就会不同”。在这里,雷海宗并没有明白指出是在那些問題的提法有所不同,可是他在这个籠統的“提法”上却得出一个毫不籠統的結論:“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論上大家都这样說,在实践上都認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中的提法是根本錯誤了,需要我們来修改它,不仅是修改它,而且是要根本地来推

翻它。如果不是这样作，就是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停滞了，而且是停滞在62年之前。那末我們就要問，恩格斯到底犯了什么錯誤呢？是不是恩格斯看到了“雅典宪法”就可以修改他的根本观点呢？显然那是不可能的。例如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的重要結論：（1）“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階級对抗中发生的”；（2）雅典国家的形成“沒有受到任何外部或内部暴力干涉”；（3）民族和国家“是直接由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这些都是絕對不可能有任何更改的。因为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結論，既是典型的，又是一般的。其典型的意义就在于即使根据“雅典宪法”看来，也証明了国家的产生不是由于一种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国家也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經濟基础上、在階級分化的基础上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暴力机关。再重复一句，它之所以是典型的，就是由于雅典历史而且是由于“雅典宪法”本身更易于証明这个問題。至于它的一般的意义，那就在于任何国家的产生，尽管在形式上看来似乎也可以有某种不同的情况，而在其实质上，凡是产生了国家的地方也都是服从如下的規律：从无階級的氏族内部有了階級的分化，有了占有生产資料的奴隶主和不占有生产資料也还不占有自身的毫无权利的奴隶的时候，作为統治者的奴隶主就一定創立他們的暴力机关——奴隶主的国家。試問雷海宗，62年后的今天，甚至就是620年、6200年的将来，能否有人敢于修改这个結論呢？当然不能！誰要是敢于修改这个結論，誰就必然是馬克思主义的死敌！那么，雷海宗到底为了什么要这样来反对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呢？一句話拆穿，就是为了使我們服从雷海宗的历史觀——

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他要证明这一点，他就心劳日拙地拿着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雅典宪法”来打倒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万古不朽的名著。雷海宗之所以要效法“蚍蜉撼大树”，就是为了这个，而且也只不过是为了这个！

可是，雷海宗还有他另外一种武器，这就是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他几乎是缺乏历史常识地说什么“铜器时代的社会唯一确知全貌的，为‘汉谟拉比法典’中所反映的巴比伦社会”。这是一个中学生也会反对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的古代典籍，特别是近世纪以来地下发掘的丰富资料，确实证明反映“铜器时代”的全貌，要比“汉谟拉比法典”所反映的不知要丰富多少倍。而雷海宗偏偏抓住“汉谟拉比法典”来否定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奴隶社会阶段。他用美化“汉谟拉比法典”的办法，说巴比伦在当时并不存在着奴隶社会。理由是“土地上有否奴隶劳动，‘法典’中全无痕迹”，“奴隶与自由人间的界线不严，奴隶可以结婚，可与自由人结婚，并且可与贵族结婚”，“奴隶主要由外购来，并非本国本族的人”等等。总之，按雷海宗的说法，巴比伦在当时不是奴隶社会，是一个“猗歟麻哉”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极乐国。而在事实上凡是稍微熟悉“汉谟拉比法典”的人，全都清楚地知道，正是在这个法典里，也同样十分生动地显示了古代东方在宗法制家庭里形成了隐蔽的奴隶制的最古的形式。“法典”的第129条，就明白地写着：丈夫是“主人”（阿尔，阿沙担姆），也就是妻子的全权占有者。这个妻子是他从岳父那里用一定数目的收买费象取得女奴隶一样取得来的。在婚约上就要指出：如果妻子背叛了丈夫，那

末，丈夫便有权在她身上加盖奴隶的烙印。从巴比倫的許多文件中都証明了出卖自己的孩子給奴隶主作奴隶的事实。負債者沙瑪什——戴揚为了償清債務就把家里所有的人以及属于他的男奴隶和女奴隶通通卖掉，才換得他自己的人身自由——也就是免为奴隶。許多文件証明，債務奴隶是当时的重要奴隶来源之一。試問雷海宗有些什么权利說当时的奴隶不是本国本族人呢？难道那些不是从本国本族人中收买来的奴隶，就不是奴隶了嗎？“汉謨拉比法典”本身就有力地証明，不管是站在沙瑪什神前面的汉謨拉比，不管是以富豪著称的达姆卡雷都是巴比倫的奴隶主。尽管“汉謨拉比法典”中的某些条文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还是証明巴比倫在当时已經形成了奴隶制的經濟，虽然它还没有达到奴隶制的高度发展阶段。我在这里还要順便举出这个“法典”中的 282 条来和“尚書”中的“盘庚篇”比較一下，那就更可以看出当时的巴比倫已进入奴隶社会，是毫无疑义的。“法典”282 条清楚地写着：对于倔强的不服从奴隶主的奴隶要割去耳朵以示懲罰。而在“盘庚篇”也有这样的句子：“奉畜汝众”，“汝共作我畜民”，在同一篇里又說到：“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这显然也是对于不服从奴隶主的奴隶而說的。）試問雷海宗，古巴比倫的奴隶主可以割掉奴隶的耳朵，古殷代的奴隶主可以割掉奴隶的鼻子，可以使他們断子絕孙，这还不足以証明同一奴隶制的殘暴刑法嗎？为什么人們把古殷代都公認是奴隶制社会而你偏偏硬說古巴比倫是一个“猗歟麻哉”的极乐园呢？說什么奴隶和自由人之間没有什么界綫呢？應該指出，雷海宗用“汉謨拉比法典”来否定巴比倫的奴隶制，比他用“雅典



宪法”来攻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不高明多少。不是证明他的狂妄无知，就是证明他的无耻的狡辩。

“雅典宪法”和“汉谟拉比法典”都证明奴隶制是个客观存在，雷海宗的笔尖子和在故纸堆中拣到的武器，都是推倒不了这个客观存在的。

这个客观存在，如果雷海宗一定要否定它的话，我认为甚至于不需要和他去分析恩格斯的著作，不需要和他去分析“雅典宪法”和“汉谟拉比法典”，因为这些东西，雷海宗是无法了解的。雷海宗不是极端仇恨甲骨文的研究工作者吗（当然这远者是指的王国维先生，近者是指的郭沫若院长）？他认为这是由于甲骨文的研究而得出了中国有奴隶社会的结论，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请雷海宗去看一看在殷墟中所挖掘出来的成百成千的殉葬奴隶的骨骼呢？请雷海宗证明一下这些骨骼到底是什么人的骨骼呢？是什么样子的社会制度，才允许人们以奴隶来作惨无人道的殉葬呢？如果雷海宗说这个又太远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请雷海宗了解一下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以前的大凉山的情况。在大凉山有所谓“格式格洛”，也就是“在锅庄边工作的锅庄娃子”，有所谓“安家”与“曲诺”，这些人不是奴隶又是什么人？（尽管安家、曲诺和锅庄娃子有所不同。）我们请教雷海宗，你对于大凉山的奴隶主把奴隶叫做是“披着羊皮的松鼠”，作何解释？这不是奴隶制到底又是什么？

事实胜于雄辩，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分析的阶级社会产生的情况，奴隶社会发展的情况，不仅在古希腊、古罗马、古雅典得到证明；而且在几千年前的古中国也没有例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也还存在于大凉山的奴隶制，也